

西方宪政民主思潮的新表现 及其批判与应对

吕列霞 陈锡喜

【摘要】近年来,西方宪政民主思潮以较为隐晦含蓄的方式重新泛起,并呈现出了新的表现形式,即其存在场域趋于网状化与媒介化,内容生产趋于数理化与指数化,作用手法趋于议题化、隐喻化与感性化,传播结构趋于横向化与圈层化。尽管其在以上内容或形式上有所变化,但作为其理论支撑的仍是西方宪政民主理论。为此要深入到其由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构成的理论基础层面,厘清其理论前提的建构逻辑与实际缺陷,以总体性解蔽其所内蕴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本质。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判别领域、优化供给、筑牢防线和完善机制等举措,警惕和防范西方宪政民主思潮对我国的侵蚀影响。

【关键词】西方宪政民主思潮;新表现;本质;批判;应对

【作者简介】吕列霞,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陈锡喜,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0)

【原文出处】《思想教育研究》(京),2022.8.82~88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0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学理化学科化阐释与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研究”(项目编号:20JDSZKZ0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大)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JHQ001)阶段成果。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针对意识形态领域显现的问题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要“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1]133}。此后社会多元主体愈加敢于向错误思潮亮剑斗争,促使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日益风清气正。反观作为“西方中心主义”派生物的宪政民主思潮,历经学理祛魅与实践纠偏后并未偃旗息鼓,转而利用民众的知识盲点与甄别弱点的驱动机制宣传更具迷惑性的观点。对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强调,“必须警惕和防范西方所谓‘宪政’、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蚀影响。”^{[2]39}归其根本为,只要西方“颜色革命”还未终止,宪政民主思潮定不会自行消退。西方敌对势力一直

以“国强必霸”的思维逻辑看待中国,而作为其西化、分化中国之思想工具的宪政民主也必然会改头换面以新的方式存续。故此,深入剖析宪政民主思潮的最新存在和转换样态、作用机制及其手法,并深入实质进行批判显得弥足重要。

一、当前西方宪政民主思潮的新表现

当前西方宪政民主思潮总体向存在场域、叙事内容、作用手法与传播结构的多样化和隐蔽化转向。这种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其固有的政治主张和价值取向,遮蔽了其实质,给研判工作增加了难度。

(一)存在场域趋于网状化与媒介化

就存在场域的整体布局而言,宪政民主思潮耦合其他异质性思潮已逐步突破原先意识形态场域的

边界,建构出其贯通政治场、经济场、思想文化场的网状型运作空间。当前宪政民主思潮在演进态势上呈现出与新自由主义、政治与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观”交织发展的复杂面相。就具体呈现形态而言,宪政民主思潮与新自由主义相互勾连,打着新闻舆论自由的幌子兜售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模式,鼓吹绝对自由的市场化、私有化和非调控化的经济体制改革逻辑;对接政治与历史虚无主义妄图以西方价值观为尺度重构我国历史,解构与污名化党的领导体制;粉饰西方“普世价值观”以代替全人类共同价值,意图虚无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宪政民主思潮在这些空间中贯彻着布迪厄提出的场域动力学原则,不断地调整其准入门槛和运行机制呈现出了不同的思想形态。

同时,当前宪政民主思潮也由实体场域转向依托互联网技术赋能赋权逻辑,打破既有时空边界转而构建出网络空间新范式。习近平指出,“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3]55}宪政民主论者正是利用媒介化生存空间这一“普照的光”催生出新的照面方式。即宪政民主论者利用互联网的交互性、即时性、去中心化特质,依托云计算等技术,凭借西方媒体的“无冕之王”地位肆意制造议题,以问题悬设、话语留白、网络规训等作用方式诱导群众参与宪政民主话题的探讨。同时,在互联网中衍化出的“意见领袖”“异见人士”更是推波助澜,利用虚拟空间炮制各类有损我国政治体制的言论引发“水波式效应”。

(二)内容生产趋于数理化与指数化

较之于此前大量炮制诸如“普世价值论”“中国威胁论”,援引“修昔底德陷阱”抑或是制造“宪政党”等显性概念和理论来论证西方政治正确,以攻击我国政治体制不同,当前宪政民主论者热衷于在“西方优于中国”这一总体性价值理念的指挥下,遵循数理逻辑建立一整套评价指数来确立其话语霸权。

宪政民主论者凭借自身的学科与技术优势垄断民主政治测量和评估领域的话语。其通过挖掘与操纵数据、建构与编排模型制造出一系列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指数产品,以看似十分中立、客观的

数字标准为西方宪政民主创造的“政治神话”做注脚。某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宪政民主论者构建出各类“人权指数”“自由指数”“民主法治指数”“发展指数”,并通过操纵数字与模拟算法对我国的民主政治、经济文化、司法外交及军事领域的发展程度做测算、比较和国际排名,其结果必然是为“西方政治制度优越论”作阐释。^[4]也有学者指出,“自由之家”“经济学人”发布的民主指数,“多头政体指数”“政体四”等所谓“客观民主指数”是带有明显意识形态偏见的指数。^[5]这就为宪政民主论者进一步宣扬西方政治理念及制度架构,鼓吹从国体和政体上对我国进行“制度革命”提供了有力证据。

必须厘清的是,这些所谓“客观标准”的背后,都内蕴其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主张,因为其选取的数据、算法的演绎与模型的建造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而这些主张的推行也完全是出于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意图。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些“客观标准”与人民的主观感受很可能是背道而驰的。

(三)作用手法趋于议题化、隐喻化与感性化

第一,设置宪政民主的生活化或学术化议题的话语陷阱,遵循“议题探讨→渲染分歧→政治研判”的宣传逻辑导向,以掌握意识形态交锋的舆论方向。其一,宪政民主论者善于扣准热点事件、敏感节点及舆论焦点抛出部分生活化议题,以幻象思维空间化逻辑为手段制造阶层对立的矛盾,引发对我国制度模式的探讨。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宪政民主论者就将中国的“戴口罩和隔离”等防疫举措,由生活化议题煽动至对“民主与专制”等政治问题的研判,借此质疑党的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其二,宪政民主论者擅长以“学术争鸣”为由渗透其政治主张。例如,利用探讨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功能问题否定其“革命党”身份并质疑党执政的合法性,借以“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史范式”之争,各执一词相互否定党的革命史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创造。

第二,裁剪政治隐喻的负向功能,绝对化、抽象化地隐含、影射与演绎我国政治制度,意图在模糊其

意识形态属性的差异中输入“无形政治”。宪政民主论者惯用所谓的“问题意识”片面挖掘从我国国情领域衍生的问题内涵、影射我国政治制度。例如,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为禁锢思想自由的“封闭之墙”,高呼“推墙精神”制造“推墙运动”;将全面深化改革中呈现的官员腐败、权力寻租等问题泛政治化,妄图将此类问题全部归咎为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诚然,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发展去解决,但改革绝非改掉我们的根本制度。在我国创造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的过程中,必然要遵循“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为解决改革发展中的矛盾问题调动整个社会资源,“三权分立”体制显然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第三,景观社会视域下感性化渗透手法的运用,在“后真相”语境下倚仗“构境式”逻辑导引群众以情感优先法则进行偏误化思考。“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从诉诸理性力量转向倚靠感性力量,宪政民主论者则乘势利用海量版“文化景观”,辅之以情感优先法则操控民众与其产生情感共鸣,使其在不觉间确置自身的立场。恰是这种从“景观幻象→情感共鸣→立场植入”的递进式逻辑在强化大众进行表象化思考的同时削弱了其理性批判思维,理性最终让位于情感和立场,这就促使现实的人逐步衍变为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动物”。同时,宪政民主论者还力争元宇宙赛道,利用VR体感设备为个体创造“拟态环境”以使其体验到资本主义的自由生活方式,鼓励其摆脱束缚追求自由。

(四)传播结构趋于横向化与圈层化

传播结构的横向化,即是宪政民主论者为迎合当前大众的“反权威”“反真理”等逆反心理所采取的促使“传播者和传播对象地位总体对等”^[6]的横向对话的传播形式。这就打破了之前以“我高你低”“我说你听”为特点的自上而下的纵向传播结构。宪政民主论者为制造这种平等对话的假象,减少了对所谓的“专家”“权威”等精英身份的使用,转而以草根形象自居蓄意制造议题发表其宪政民主观点,进而

以热点事件等为噱头左右民众的思维方式。例如,其在网络空间发表“民主创造美国繁荣”“自由推动美国科学进步”“中国党大还是法大?”等言论,引发民众不自觉地反思中国的自由民主法治等理念。

传播结构的圈层化,即指根据用户的信息浏览和订阅为其画像,并依托算法技术进行针对性传播以最大化地聚合“志同道合”人士。宪政民主论者为扩大其思想主张的覆盖面,其一,利用算法推荐所赋有的信息的采集分析、推送与反馈能力,将诸如“疫情躺平”等宪政民主议题夹杂于其中,并钻营用户偏好通过抖音等平台进行精准化推荐,而一旦用户浏览了此信息将会被平台追踪而不断地被动接收到此类同质化信息,陷入“信息茧房”困境。其二,通过创设网站、论坛等建立多元传播体系,进而将自身的主张传播到各类载体,并利用多元载体间的点赞、订阅与转载实现交互式扩散。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言,“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性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7]^[69]的意蕴所指。

二、西方宪政民主思潮的理论基础批判

尽管当前西方宪政民主思潮在其内容或形式上有所变化,但作为其理论支撑的仍然是西方宪政民主理论。为此要深入到其由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构成的理论基础层面,厘清其理论前提的建构逻辑与实际缺陷,剖析其所内蕴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本质,才能对其进行彻底批判。

(一)本体论批判:理论逻辑建构前提的分析与校正

本体论问题是作为一般理论得以建构的理论前提,而宪政民主思潮得以建构的理论前提和依据则是作为其“本体论”基础的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唯有厘清这一理论前提的内在结构及其意蕴才能把握宪政民主思潮的实质。聚焦宪政民主理论的缘起及流变得出,其是伴随资产阶级的崛起而衍生的政治理论,亦是资本逻辑、抽象哲学与西方宗教文化的联姻,自出场就带有不可避免的理论缺陷。分析学界对宪政民主理论前提的研究,大致包含三个维度。

第一,就作为上层建筑的宪政民主理论产生的

经济基础而言,其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追求马克思所判定的“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的绝对规律。资产阶级正是通过无止境地剥削无产阶级以求得剩余价值最大化,同时基此生产方式建立起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以维系整个社会的运行。正如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始终“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18]601}

第二,谈及宪政民主理论的政治哲学根基时,学界普遍认为其是近代抽象自然法学说与社会契约论的结合。自然法学说秉持先验论原则,主张自然法先于国家而存在,利用自然法能解释国家与社会的一切现象。但事实却正如某学者指出,自然法学说自古希腊出场绵延至今数千年,其无论是对正义理性的追求,亦是对“理念”“上帝”“权利”的希冀都具有唯心主义色彩,这与马克思的实践观背道而驰。^[9]社会契约论则基于自然法学说提出,国家与社会的生成、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等都是签订契约的结果,这也就决定了宪政民主理论不可能科学地揭示社会发展规律。

第三,政治文化是政治制度的基因,故分析宪政民主理论必然离不开对其赖以生存的政治文化的批判性反思。政治学者认为,宪政民主理论植根于基督教文化,而其中的原罪文化、权力悲观主义、二元政治观则是其重要组成。^{[10]263}原罪文化秉承人性恶论,宣扬人性自私和“无所不在的恶”,由此演化出西方权力设置中分权制衡的逻辑定律就是基于对人性的怀疑和权力的悲观。而承继了二元政治观的宪政与民主的二元化结构,却于世俗化中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分野。

(二)认识论批判:基于“绝对普遍主义”的形而上学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的民族与社会都将按自己的内在要求选择或塑造不同的政治形式,从而形成政治形式的多样性。”^{[11]257}各民族的政治形式能为其他民族的发展提供借鉴,但只能作为区域性发展模式而不能称为“普世模式”。

第一,宪政民主论者幻想遵循“绝对普遍主义”的形而上学观,利用西方政治制度之抽象的“特殊”

代替现代化建设制度选择之“普遍”,这必然会因缺乏现实根基陷入唯心主义桎梏。马克思指出,“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2]222}宪政民主制是由西方的经济制度、政治实践和文化传统所决定和生成的历史性产物,蕴含特定的价值理念、政治主张与制度架构。宪政民主论者却妄想把这一完全反映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政治制度“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2]180}扩张至全球,这显然违背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不符合资产阶级宣扬的理性至上逻辑,反倒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绝对观念”颇具异曲同工之处。

第二,宪政民主论者违背辩证法原则,简单套用西方宪政民主的标准衡量我国的制度模式,抑或是将我国的政治方略视为西方宪政民主的逻辑推演,强行嫁接“社会主义宪政”“宪政合理论”希冀实现“绝对式自由民主”。马克思指出,“在考察复杂社会问题时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13]5-6}社会生活本身的复杂特质决定,我们在考察某一制度是否适合某国的国情时须采用辩证思维方式,切不能盲目运用形而上的方式解读制度模式。宪政民主论者却忽视其他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境遇,标榜西方宪政民主是解决任何国家问题的“灵丹妙药”,甚至以西方制度模式作为唯一参照系把我国归入到“人治国家”“专制国家”行列。更有甚者高谈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使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那“社会主义+宪政”必然能推动中国政治的发展。这种行为俨然成为了马克思所言的使现实成为了“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2]153}。

(三)价值立场批判:“普世论”遮蔽下强制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作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14]169},而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领导下生成的我国政治制度模式必然是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宪政民主论者则是将其主张贴上“普世”标签以遮蔽其服务于资产阶级意志的政治立场。

第一,不存在绝对化的“立场客观”之说,那些鼓

吹“宪政民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模式”的论调,实则是站在强制阐释的立场进行逻辑预判。所谓强制阐释,即是“偷换对象,变幻话语,借文本之名,阐本己之意”。^[15]宪政民主论者正是持此立场,妄图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准则衡量我国的政治体制、政权结构与法治建设等方面,并强行拟制出“社会主义宪政论”以实现理论自治。殊不知,政治制度效能高低的判定须秉持科学思维,站在一定的立场,将其置于特定境遇中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真相。任何切割历史与现实的整体性、连贯性而“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16]364},并以此为依据检验制度好坏的方法注定站不住脚。而且依循辩证否定原则也可得出,宪政民主论者冠以否定之名抨击我国的政治体制,在实质上隐含着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同。而基于此种“先验式”的强制阐释和辩证否定原则表明,宪政民主论的立场绝非其所谓的“客观”,更达不到“普世”。其实质是假借“普世”这一政治修辞幻象在全世界范围内输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及制度模式。

第二,宪政民主论者高扬的“主权在民”“保障人权”等政治宣言,是抽空既有的客观事实和制度实践形成的政治空话。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用以统治人民的话语工具,这严重背离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观点。无论是“主权在民”还是“保障人权”,其都是脱离阶级本质抽象地谈论“人民”“人权”。这从表面上似指广大民众,但实质是资产阶级手握国家权力,普通民众只拥有宪法规定的“人们不能行使的”“虚幻的权利”^{[17]328}。邓小平也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18]25}宪政民主论者的这种表述显然是肤浅。究其本质就是宪政民主论者宣扬的政治口号与其制度实践间存在悖论。诸如三权分立名义上的权力制衡与实质上资产阶级专政的矛盾,多党制宣扬的选举民主与实际选举被资本绑架的制度困境等,故在今后的发展演变中走向衰败在所难免。现如今西方国家治理效能低下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些悖论。这就进一步得出,既然“普世”制度都普不了资本主义的世,那又何

谈普社会主义之世?

以上三点均致力于从理论逻辑层面进行横向批判,而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维度考察宪政民主理论在中国的出场,即无论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还是张君勱的“修正的民主政治”等都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希冀于学习西方宪政而救亡图存的一种政治选择,但均以失败告终。由此证明,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就行不通,现在更行不通。

三、应对西方宪政民主思潮侵蚀影响的策略

警惕和防范宪政民主思潮的侵蚀影响,须扎根于社会现实领域铲除其存在发展的空间,进而全方位、宽领域、多举措筑牢抵御宪政民主思潮的安全防线。

(一)判别领域:依据宪政民主思潮的不同表现形态设定纠治边界

要准确辨析宪政民主思潮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形态,严格区分政治问题、学术问题和生活化问题的界域,避免泛政治化、去政治化的错误倾向。当前宪政民主思潮已渗透到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史实要求,要厘清其在这些领域的不同主张进而设定好其纠治边界。为此要明晰三点:其一,宪政民主思潮代表资本主义“特殊性”主张,不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普遍利益,故对此类政治主张要警惕去政治化倾向;其二,党中央提出“警惕和防范”的是在西方“颜色革命”浪潮中被赋予意识形态意蕴的宪政民主思潮。宪政民主论者则以西方宪政民主理论为自体论根基,意图制造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并进而侵蚀我国的政治制度基础,对于此类错误思潮及其主张必须彻底否定和批判。其三,对普通民众在政治及社会等领域的合理诉求,党员干部要倾听群众呼声以合理协调矛盾冲突,避免泛政治化倾向。

要准确划分思想舆论领域的“三个地带”,对不同地带采取不同的意识形态治理策略。宪政民主论绝大部分隶属黑色地带,即是“各种敌对势力制造的舆论”^{[19]30}。对此类宪政民主论的拥趸者,要将其纳入到法治化治理轨道,而对其所依附的微信、贴吧等平台,要责令其严加整改。进一步地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运用法治思维正确规范和引导舆情方向。同时对那些跻身于“灰色地带”政治立场

摇摆不定的,则亟须党员干部和主流媒体等正面力量构成的红色地带“大规模开展工作,加快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防止其向黑色地带蜕变。”^[19]³⁰但也要明晰,思想认识问题绝非是纯粹地压制,这种斗争要讲究策略。

(二)优化供给:突破宪政民主藩篱阐释好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优势

宪政民主论者创新指数产品确立其话语霸权的现实启示我们,要突破西方宪政民主的钳制,警惕那些以学术研究形式出现的“客观标准”。最为关键的是,要建构出彰显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优势和强大治理效能的理论和话语。

第一,要扎根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实践特质,从其出场、演进、生成与发展的具体的时空结构中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概念、理论和话语以实现“供给侧改革”。这就要求,一方面,要置于大历史观的视野下,从历时性维度考察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生成、发展与演进历程;另一方面,要从横向的空间维度分析归纳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结构特质与总体性样态。即要置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野中,在纵横交错的时空领域中把握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特质,基于此打造出具有标识性的概念、理论和话语。同时要紧扣其实践特质创新话语表达方式,优化话语叙事逻辑,将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实践优势讲清楚,以强化群众的认同和践行。

第二,要依托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理论和话语的生产。习近平指出,要“构筑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为坚定制度自信提供理论支撑。”^[20]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将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理论和话语建构主动纳入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研究范式与叙事体系中,以在体现中国话语的自主性与原创性中阐释好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本质优势;另一方面,要推动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视域融合,建立这两种话语间的内在转化机制,这是提升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话语的历史穿透力与现实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三)筑牢防线:在强化政治判别力与斗争力中增强民众的“免疫力”

当前宪政民主思潮的作用手法趋向于多元化、隐蔽化,由此决定要提高政治判别力与斗争力,强化国情认知与制度自信教育以筑强民众的“免疫力”。增强政治判别力,甄别宪政民主思潮的多重变体是首要前提。源于西方宪政民主制在非洲等地已出现“水土不服”,宪政危机时有发生的事实,宪政民主思潮一改往日之强势气焰而日渐式微以谋求新的存续方式,即以更具隐蔽性的方式实现了话语重构和策略转型。故对宪政民主思潮的性质、特征、演变趋势及联动规律,理论界要透过其理论传播和渗透的多重表征深入到其源头上,剖析其理论基础及理论依附并进行彻底性批判,以实现对其宪政民主思潮的整体性解蔽。

同时,要敢于斗争敢于亮剑,牢筑抵御宪政民主思潮的安全防线。习近平指出,“各种敌对势力从来没有停止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始终企图在我国策划‘颜色革命’。”^[21]¹⁸¹宪政民主思潮就是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思想武器。对此,党员干部要切实贯彻意识形态领域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的要求,勇于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旗帜鲜明的意识形态斗争。同时,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党的“喉舌”和“耳目”功用,适时主动设置议题以掌控舆论交锋的主导权。

最为关键的是,要在制度自信教育下扎根国情教育,防止宪政民主论者就地选材设置议题大做文章。我国在总体上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内外存在的诸多结构性矛盾尚未化解,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正在行进中。对此类改革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问题:一方面,党要致力于以自我革命领导伟大社会革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化解现存的结构性矛盾,不断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另一方面,党员干部及媒体要引导群众正确认识这一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以及时代特征、我国的发展现状和问题矛盾,帮助群众在深谙国情的基础上理解新时代治国理政新战略,进而引导其强化社会责任意识,提

高政治认同度。

(四)完善机制:建立健全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体制机制

当前宪政民主思潮主要依托新媒体技术进行意识形态传播和渗透的史实要求,净化其赖以存续的网络空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新生态是当务之急。

第一,要建立全方位、立体化、联动性的网络舆情监管体系,提高意识形态工作主体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舆论预测与分析的能力。针对宪政民主思潮在网络空间大肆渗透和传播的史实,党和政府等各类主体要学会运用新媒体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建立更为科学、优质、高效的网络舆情研判、分析与监管体系,并及时地跟踪、监测宪政民主思潮在网络空间中的动态演进轨迹。针对敏感节点、热点事件、重大事件以及重点人群,要善于扣准时机节点、讲究方式和策略、力争把握好时效度,进行常态化、全方位监测,力争防患于未然。

第二,要建立健全对算法推荐信息的话语审查和管控机制,形成严密的话语管控格局。对网络空间中显现的宪政民主论者的错误言论,要构建人工审核和网络信息审核的协同机制。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精准识别、筛选与拦截宪政民主论的话语内容,严格控制其在微博、微信与抖音等平台公开发表错误言论的权限,严把政治关;另一方面对那些隐蔽性强、较为晦涩的错误言论,要将其纳入到人工审核的管控范围之内,形成多环节内容验证,淘汰和屏蔽具有错误价值导向的宪政民主论者的信息,最大限度地挤压其网络存植空间。

第三,要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建立健全网络舆论引导“统一战线”的主体和格局,让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舆论居于主导地位,最大程度地弘扬主旋律与传播正能量。对此,我国的主流媒体要及时地找准突破点,设置正向议题坚决反击宪政民主论的错误论调,打造正确的舆论引导格局。同时,各类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要下沉至网络舆论场域中,准确地把握整个网络舆论引导过程的相

关要素,打通网络舆论引导的各个环节,形成环环相扣的联动效应。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2020.
- [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3]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4]阚道远,郭蓬元.论新时期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新路径[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10).
- [5]杨光斌,释启鹏.带有明显意识形态偏见的西方自由民主评价体系——以传播自由主义民主的几个指数为例[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5).
- [6]王哲.近年来错误思潮表现方式的变化及应对[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5).
- [7][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 [8]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9]史宏波,田媛.西方宪政民主思潮的理论缺陷及政治实质辨析[J].思政教育研究,2018,(5).
- [10]王岩等,著.批判与引领:当代中国非主流社会思潮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
- [11]王沪宁,林尚立,孙宏宏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4]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15]张江.再论强制阐释[J].中国社会科学,2021,(2).
- [16]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9]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20]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J].求是,2019,(23).
- [2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